

● 翻译研究

# 翻译文学经典研究中的问题与思考<sup>\* 1</sup>

宋学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绍兴 312000)

**提 要:** 传统认识的因袭性使我们习惯在“外国文学”分类中寻找各国文学的翻译作品,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剥夺翻译文学独立存在的合法性诉求,翻译文学经典因而长期被外国文学经典遮蔽。翻译文学经典化既是翻译文本自身的艺术生命在译入语社会找到适宜生长的文化气候和土壤的结果,也是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在翻译文本中找到可以利用的政治诗学价值的结果。没有译者在艺术再创作过程中的匠心打造所完成的内部经典化,就谈不上译本形成后在译入语社会流通与传播过程中的外部经典化。我们既要看到文学的审美自律,也要看到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既要看到文化对文学经典的祛魅,也要看到它对文学审美的遮蔽。

**关键词:** 翻译文学经典; 外国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内因与外因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7)01-0067-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1.012

## Problems and Reflection in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ed Literary Canons

Song Xue-zhi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312000, China)

Due to traditional ideas, we have long been used to looking for translated works in the categ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Dualistic mindset deprives the legal appeal of the independent existence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thus, translated literary classics are always shadowed by foreign literature. The canoniza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translated text itself finding proper cultural atmosphere in the target language society,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target language society's ideology finding the utilizable political poetics. Without the internal canonization accomplished with the translator's efforts in the process of artistic recreation, the external canonization of the translated text in its circulatio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society is impossible. We should notice the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as well as the disenchantment of culture upon literary canons and its shadow over literary aesthetics.

**Key words:** translated literary canons; foreign literary canons; ideology; internal cause and external cause

### 1 被外国文学经典遮蔽的翻译文学经典

#### 1.1 遮蔽现象描述

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在文学经典大讨论的语境中得到借鉴,开始摸索和建构自己的话语空间。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受传统认识和知识结构的影响,还有部分学人用“外国文学经典”的概念代替“翻译文学经典”的概念,造成“外国文学经典”概念长期遮蔽“翻译文学经典”概念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研究”就不是对

原语外国文学经典阅读的跨文化、跨媒介研究,而是以翻译文学经典为对象的研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影响”显然不是指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对原语外国文学经典的影响,而是对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经典即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20世纪外国文学经典化问题”不是发生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外国的文学经典化问题,严格地说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在中国本土的经典化问题,即翻译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文学汉译经典研究”(12BWW041)的阶段性成果。

翻译文学经典与外国文学经典的不同,近年来,已渐渐得到我国外国文学界尤其译学界和比较文学界学人的认同(徐红 2015,黄巧亮 2016)。查明建(2004:16)在“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一文中,明确使用“翻译文学经典”代替“外国文学经典”,“因为中国大部分读者接触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是翻译作品,‘外国文学’很多时候指的就是翻译文学”。在我国,认同“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独特组成部分”的学者,也都认同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否则他们不可能把翻译文学归入中国本土文学。简单地说,原作与译作的不同在于:原作是原作者个人所为,译作是原作者与译者共同所为。翻译主体通过语言的变更、语境的变迁,不可避免地要融入译作中其个性化的审美习惯和译入语民族的审美风格。虽然“创造性叛逆”的目的不是叛逆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蕴含,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作品生成后的文学性与外文原作的文学性在客观上必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既反映出译者与作者之间细微的个性化差异,也透露原语与目的语两个语境间的民族性差异。

有些学者也意识到翻译文学经典与外国文学经典二者的不同,虽然他们没有使用“翻译文学经典”这一术语,但明确表示“英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曾艳兵 2010:28),“西方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同上 2009:31)。即便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我们也可以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作者的所指,即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翻译、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其经典地位在新环境中的重新建构。然而我们无法否认,在语义学上,“外国文学经典的重构”这样的标题也可以表达:外国文学经典在外国遭遇解构和重构的历程。当然,我们还可以理解为: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确立经典地位后,又经历政治性的解构,进而再次确立其经典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学经典”实际上就代替“翻译文学经典”,因可以说它遮蔽“翻译文学经典”。

### 1.2 遮蔽现象分析

怎样解释这种现象的存在呢?我们认为,首先是传统认识的因袭性使然。从翻译文学作品出现以来,我们基本上将其视为外国文学的等值品来阅读、了解和认识。从“西洋文学介绍到中国影响最大的第一部小说”(郭延礼 2005:210)《巴黎茶花女遗事》起,就出现一个别有风味的西洋文学景观,它与中国传统文学颇为不同,以致我们

只顾欣赏异域风情,而全然忽略译者再创造性质的参与,忽视译文被“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傅雷 1998:478)。从学生时代我们走进书店、图书馆,我们便习惯在“外国文学”分类中寻找各国文学的翻译作品,默认翻译作品就是外国文学的划分。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合理呢?把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并非全无道理,因为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内在本质性联系不可否认,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翻译文学完全等同于外国文学,那就忽视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也说明我们可能还在沿袭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只注意到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即外国文学)的关系。

文学翻译活动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翻译文学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结果,而文化交流的交往互动性在翻译文学上的一个表现,也许就是原语影响与目的语接受间的互动(当然还可以有其他的交往互动)。“世界、语言和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语言如何将人和人的世界联系起来的问题。”(刘辉 2010:27)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生成过程,目的语民族特有的文学性和文化性元素难免通过语言的变更而介入,忽视这种介入必然会使我们的认识偏于一面,也就导致我们把认识的部分合理性视为涵盖整体的合理性。

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在于,在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的思维就处在非此即彼、非白即黑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和二元论的认知框架中。从中国视角看,文学作品不是中国文学就是外国文学,似乎只有这两种划分。在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这两种选项中,文学院里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教师只能说他是研究外国文学的,而绝不会说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甚至,即使我们认识到翻译文学既属于外国文学也属于中国文学,具有双重性,我们也只是“摆脱了二元对立,却没有摆脱二元论”(宋学智 2006:275)。翻译文学作为跨语言和跨文化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一方面,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保持着密切关联,它是原语民族的文学内容和译语民族的语言形式的有机化合;另一方面,相对于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它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品格,即独特于原语文学的新文化空间里的新生命形态和独特于译语文学的异国风情与文明。虽然它使用的是译语的语言形式,但原语的不同词法、句法和文法必然使译入语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挥之不去的洋腔洋味,因而它自身已经形成一种既不等同于外国文学和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学的别样的、新颖的、带有陌生化的审美

范式。

在多元论取得硕果的当代,在摆脱二元论的开放视野里,随着学科越分越细和研究领域越做越专的趋势,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发表自己的观点。乐黛云认为,“翻译文学由于其进入了另一种文化语境,在另一种语言结构中,并通过译者个人的思想和语言习惯来表达,这就构成一种新的文学”(孟昭毅 李载道 2005:序1);翻译文学是介于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二者之间的文学形态(同上:1);翻译文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型,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方式”,它“既是一个中介性的概念,也是一个本体性的概念”(王向远 2004:6,11)。所以,与其把翻译文学束缚在传统的学科分类里,不如给翻译文学一个应有的独立地位,这将既是翻译文学自身的一个好出路,也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个新天地。然而,要想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将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的“模糊认识”(谢天振 查明建 2004:1)并不容易,上述观点并不能全面清除在认识论上外国文学遮蔽翻译文学的现象,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似乎还在迫使翻译文学要么属于外国文学,要么属于中国文学,阻止翻译文学自成体系,剥夺翻译文学独立存在的合法性诉求。

## 2 翻译文学经典化问题

### 2.1 外部经典化与意识形态

随着我国文学经典研究的展开,翻译文学经典化问题也成为近年来我们关注的一个热点。美国学者勒菲弗尔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和福柯的“权力话语论”的基础上,提出操纵文学翻译的3种基本力量,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他的论点在中国学界得到有力的回应,在中国的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无论中国的翻译小说、翻译诗歌还是翻译戏剧,抑或中译外的文学作品,都在这3要素中找到翻译作品经典化的理论支援。

然而,以3要素剖析中国语境中的翻译经典化问题,严格说来,不能算我们的研究成果,而只能说明3要素理论具有较强的阐释力和较广的适宜性,我们不过是帮助勒菲弗尔验证3要素理论的正确性和普适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还在于,我国的翻译文学经典化现象是否都能在3要素中找到答案,有没有中国特有现象超出3要素的解释范围,这种研究可能才是真正的创新所在。

我们就以意识形态视角为例考察。我国学人

的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有以下几种现象:第一,在翻译文学经典化研究中,无论是把“名不见经传”的西方作品“拔高”为经典,还是把西方具有经典地位的翻译作品打压下去,意识形态的操控似乎只有负面的因素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似乎不太关注政治与艺术的真正“合力”,似乎意识形态的正面影响显示不出那只“看不见的手”。第二,我们近年来对翻译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探讨,似乎通过种种实例举证和个案分析,得出确为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个结论便大功告成。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不应当仅仅是运用别人的新的理论观点说明某个现象,而最好是在运用别人的新理论观点时,又有新的启示和发现,对别人的新观点有所超越与突破。先说西方,在当代西方文学经典化与去经典化的博弈中,不仅仅是集团之间、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辩与较量,说到底,在各种意识形态尝试影响经典的背后,在各种文化主体性争夺话语权的背后,是各种集团、各个阶级的利益之争,比如,或者是为了维护长期盘踞文化中心地位的“已死的欧洲白种男人”代表的利益,或者是为了能位移给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黑人和女权主义者,体现他们的利益。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观念形态,它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社会观念形态的解释不是最终的解释,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解释才是最终的解释”(童庆炳 陶东风 2007:84)。在此借用恩格斯对早期宗教狂热背后的原因分析,可以说,“在每一次意识形态转移的背后,‘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恩格斯 1965:526)。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操控’,还不如说是‘现世利益’操控”(童庆炳 陶东风 2007:84)。第三,意识形态不只是存在于文本外的既对文本虎视眈眈又让人看不见手的幕后操纵者。意识形态也存在于文学作品中,因为任何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世界观、社会观,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指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只不过经典文学作品的作者会把其世界观、社会观以及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用成熟的艺术手法,包括艾略特指出的那种“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语言的成熟以及共同文体的完善”融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王恩衷 1989:194)。进一步说,“文学的本意就是意识形态”(Eagleton 1983:20),因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而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体现”。否则,鲁迅恐怕也不会弃医从文,梁启超也不会“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

的手段”不会“以译西书为强国第一义”(谢天振查明建 2004: 47)。须要说明的是,同样,译者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勒菲弗尔说“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强加于他的……”(陈德鸿 张南峰 2000: 177)。所以从意识形态角度说,翻译文学经典化是文本以外的意识形态与文本内部意识形态的合力实现的,要么是文本内部的意识形态观念顺应文本以外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要么是文本以外的意识形态对艺术价值高的文本中的意识形态进行挖掘和放大,或进行“六经注我”似的阐发,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换言之,翻译文学经典化是原作者有意无意表露出的意识形态观和译者通过主动或被动的选择而表露出来的意识形态观与赞助人及强势意识形态三方的默契或协商,或前二者被后二者绑架、操控来完成的。第四,翻译文学经典揭示政治意识形态的可变性与艺术价值的不变性关系。我国当代的西方文学经典大都经历建构、解构和重构的历程。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例,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它是新老两代进步青年的宝典;但50年代中期至改革开放之前,它受到“一层层左的意识形态”的拷问与解构,“是建国以后外国文学中不仅不被善待,反而最受虐待的一部名著,对它的‘严正批判’、‘肃清流毒’、‘清除污染’,几乎从未中断”(柳鸣九 1993: 273)。70年代末起,随着改革开放和文化开禁的春风,它再度拥有众多的新老读者。也就是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我国经历过经典化、去经典化和再经典化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真正决定一部文学经典地位的是作品自身的文学价值,是经典作品的文学价值使其穿越历史、穿越时间。文学标准虽然不时会受到政治标准的绑架,但政治价值不可能因意识形态的暴力而获得与文学价值一样的恒久性。真正的文学经典以其不变的艺术价值面对不断变化粉墨登场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真正的经典经得起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正如柳鸣九所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价值是“永恒的,不会随制度、路线、政治、帝国、联盟的嬗变而转移”(柳鸣九 2005: 31)。所以,从短期看,文学作品只有顺应政治意识形态才能获得当下经典的地位;从长期看,决定一部经典留在艺术殿堂的是其艺术价值而不是政治价值。

## 2.2 关于译本内部经典化

认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使文本经典

化的学者,很注重文本的外部因素在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似乎任何一个文本都可以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颐指气使下获得经典化。于是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在文学系统里,文本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是这种过程的结果”;“经典地位是某种行动或者活动作用于某种材料的结果,而不是该种材料‘本身’与生俱来的性质”(佐哈尔 2002: 11)。主流意识形态为什么选择此文本而非彼文本进行经典化,似乎并不重要,然而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追问。据查明建统计,从1949年至1958年,仅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就达3526种,但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为经典的恐怕只有其中的百分之一。那么,政治文化权力部门会抽签式的随意指点某部作品对其经典化吗?会单单选择那些最能表现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作品来经典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典化不仅仅因为它“很好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教材”(查明建 2004: 110),也因为其中有令当时青年读者心动的爱情故事。

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只能告诉我们,经典文本不是诞生在一个真空中,而是诞生在一个有利于其生存的政治文化场域。但这并不等于说,文本内在的艺术价值可以忽略。如果我们认识到,作品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空间构成文学经典的内部要素,那也应该认同,文学经典的内在要素也是文本经典化不可或缺的生成要素。经典的建构是人为的活动,我们不能说在这人为的活动中只有政治权威、文化权威、学术权威以及读者、发现人和赞助人等,而唯独缺少作者本人。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作者是文学经典的开创者,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空间首先是作者创作出来的,他为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等形形色色的“巧妇”提供经典化活动可以连续下去的“有米之炊”。如果我们指出,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从作家的创作开始,而不是从文本形成之后开始,那是因为其一,如果仅从文本形成之后开始,那就意味着任何作品形成之后都可以经典化,文本自身的生成过程和生成结果并不重要,而这显然说不通;其二,确立经典的一个目的是为文学系统里的创作活动提供典范,而我们想要搞创作需要学习的是作品里的艺术手法,却不是作品外的意识形态的操控手段;其三,经典的艺术价值在作品完成之时已基本确立,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褒贬而发生质的改变。总之,我们不可能把任何形成的文本交给意识形态去操控就能完成经典的建构,因为这样我们只关注一半却遗漏另一半,“而遗漏的

那一半从定义上讲更真实、更富活力、更有本质意义……”(塞尔顿 2006: 328)。鉴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也许可以把作者的艺术创作视为文本经典化的第一步,把外部的社会、文化、政治的调适乃至操纵视为文本经典化的第二步,或者,把前者称为文本的内部经典化,把后者称为文本的外部经典化。

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翻译亦然。如果说,文本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是作者创作出来的,那么译本中的艺术价值和可阐释空间就是译者再现出来的,其再现的过程就是译本内部经典化的过程。翻译活动的经典化,不仅仅在于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等环节上,更在于译者在化合原作的精神蕴含和译语的语言形式为一体的过程中,其艺术匠心的超凡展现,其审美观、价值观、诗学观以及鉴赏力、判断力和阐释力如何让读者折服,留给读者经典的回味。提起巴尔扎克,我们就会想起傅雷的译本。但与傅雷同时代还有两位译者,一位是语言学家高名凯,共翻译巴尔扎克 21 部作品;另一位是穆木天,也翻译过巴尔扎克十来部作品。傅雷翻译出版 14 部。“三者皆曾留学法国,所译巴氏作品,以穆木天为最早,以高名凯最为系统”,“傅雷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既非最早,亦非最多”(杨小洲 2011: 144)。然而今天,高名凯与穆木天几乎淡出读者的视野,年轻的读者甚至不知道这两位译者,而傅雷已经成为巴尔扎克在中国的代言人。3 位译者的作品都经历相同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语境,但唯独傅雷的译本流传下来,这或许可以说明,对于文学作品包括翻译文学作品来说,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以外,还有文学自身的价值体系在起作用,而傅雷的艺术再创作实践经典化翻译作品,才会被一代代的读者接受,奉为宝典。

所以,忽视译本经典化过程中译者的艺术再现之功,而只关注译本在译入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之下的经典化,应当是片面的。2010 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优秀文学翻译奖”空缺,原因在于“翻译作品质量的下降”。这也说明,翻译文学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形成翻译文学经典的首要条件和内在条件。有时,译者的经典化不但是抹不去的,而且可能远远大于译语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典化。例如爱伦·坡,我们一定认同他是由于波德莱尔的翻译而成为世界经典作家的,但我们恐怕不会说,他是由于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操纵而成为经典作家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

本原因,外因只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从这个认识层面看,文学作品包括翻译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决定因素,应在于文本或译本自身的诗学价值。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只是促使其经典化的条件,哪怕这条件是重大的、必不可少的,它也只能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说,通过挖掘艺术价值高的作品中的政治诗学价值,来构建符合其意识形态话语解说的文学经典。当然,唯物辩证法也认识到,内因与外因不是绝对区分、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 3 结束语

“科学研究是用一定的方法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一种探索。”(刘辉 2015: 119) 尽管“翻译文学”一词早在 1920 年就出现在梁启超的文章中,但它作为一个有实质内涵的自体概念的出现,还是近十年来的事,严格说,还在建构中,至少目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请中,仍把“翻译文学”归入“外国文学”的学科分类中。这就给我们两点感想:一方面,我们的认识常常因袭传统,所以会在“外国文学”的标签中寻找“翻译文学”的家园;我们的思维常常是惯性的,所以会习惯地走进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里。另一方面,学术的创新,偏偏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认识,打破因循守旧,才能发现新的耕耘天地。翻译文学经典研究对于探索世界文学的新标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翻译文学经典化,就目前我们的认识而言,它既是翻译文本自身的艺术生命在译入语社会找到适宜生长的文化气候和文化土壤的结果,也是译入语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在翻译文本中找到可以利用的政治诗学价值的结果;另一方面,没有译者在艺术再创作过程中的匠心打造所完成的内部经典化,就谈不上译本形成之后在译入语社会流通与传播过程中的外部经典化。

最后,文化学派的研究宗旨是要我们在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场域加以探讨翻译现象,要我们把握社会文化体系整体,不满足于从原文到译文的局部,希望在文化空间里更全面地认识文学和翻译活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既要看到文学的审美自律,也要看到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同时,我们也认为,探讨文学的文化层面,是为了拓展文学的空间;走出文学的封闭圈,是要在更大的天地发展文学性;具有文化视野的目的,应当是使我们更明晰文学的本性与定位,更关注文学的向度与前途;超越文学绝不是为了撇开文学、抛弃文

学,而是要从文化的高度更好地认识文学本身,彰显文学的特性。在翻译文学经典问题上,我们认为,文学研究应是内部研究,文化研究应是外部研究;文学性是第一位的,文学价值是决定经典的长效因素。“文学的生命主要还是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化性”(宋学智 2006: 285);而“事实上‘审美价值’就是文化资本”(杰洛瑞 2011: 311)。所以另一方面,我们既要看到文化对文学经典的祛魅,也要看到它对文学审美的遮蔽。不能因为大文化就小文学;更不能因为文化,就不再文学。

#### 参考文献

- 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 恩格斯.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傅雷. 傅雷文集·书信卷[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 郭延礼.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 黄巧亮. 文化态势与翻译策略选择[J]. 外语学刊, 2016(1).
- 杰洛瑞. 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刘辉. 本体论视域中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观[J]. 外语学刊, 2010(6).
- 刘辉. 学术论文方法部分词汇的比较研究[J]. 外语学刊, 2015(2).
- 柳鸣九. 罗曼·罗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 1993(1).
- 柳鸣九. 超越荒诞——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5.
- 孟昭毅 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塞尔顿.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宋学智. 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受[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童庆炳 陶东风. 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王恩衷. 艾略特诗学文集[C].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 王向远. 翻译文学导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谢天振 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 徐红. 文学翻译的辩证观[J]. 外语学刊, 2015(4).
- 杨小洲. 傅雷译巴尔扎克独特魅力在哪里[A]. 傅雷的人生境界[C].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曾艳兵. 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演变[J]. 湘潭大学学报, 2009(4).
- 曾艳兵. 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10(2).
- 查明建. 文化操纵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2).
- 佐哈尔. 多元系统论[J]. 中国翻译, 2002(4).
- Eagleton, T.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 Katan, D. *Translation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Lederer, M. *La traduction aujourd'hui: Le modèle interprétatif* [M]. Paris: Hachette, 1994.
- Lefevere, A. *Translation History Culture: A Sourcebook* [M]. London: Routledge, 1992a.
- Lefevere, A.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amework* [M]. New York: MLA, 1992b.
-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c.
- Nieto, C., Booth, M. Cultural Competence: Its Influence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0(4).
- Nord, 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M]. London: Routledge, 2008.
- Venuti, L.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Vermeer, H.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A]. In: Venuti, L.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2000.

定稿日期: 2016-12-08

【责任编辑 谢群】